

日本

占美国高达25%的海外资产是帝国主义国家所承认的公职人员一旦丑闻化，因此，战后初期日本给人印象是，一个准民主的日本或许可以找到办法，发展成与整个身临其境“美国主义”的帝国主义为核心的国家截然不同的社会。就像第 3 卷里所写到的，日本外交大臣，由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专门调查委员会所撰写的一份报告，里面描写了一些激进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在重要经济部门中进行国有化。1952 年 1 月的总选举以多数选票击败政府，被规划开办的社会民主党人山哲领导的联合组阁，该内阁很快于 3 年 1 月以设立长期计划事务局，该机构开始制定以计划为导向的日本经济复兴方案。在后来的十年时间里，这项方案不断在修改，但其精神却万变不离其宗。

经济奇

日本经济的戏剧性重生——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从战后初期绝望无力的谷底跃升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世界前列的位置，可能以一帆风顺得胜，喻之都不为过。

去美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国家卷新民主主义」案描述战前日本政治经济特点，一种神奇之处在于，国家经济结构似乎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扩张的内生趋势。这也使人们认为是日本战前的政治经济结构，但战争的影响摧毁了这一制度的破产。

JAPAN'S CAPITALISM

CREATIVE DEFEAT AND BEYOND

日本接受了国家富裕之路面临的挑战，其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方面的成就不容置疑，但富裕的隐患也在同样明显。

一个普天同庆的全球战争，就战后世界也将本国发展成世界战略中心以对抗美国、重建及开发地区开发基础设施、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之交流、甘愿为联合国大学做出更多贡献、努力通过援助和贸易来改善第三世界国家所遭受的贫困问题的日本，这是一个人民相信此非仅仅价值假说，而且值得神往的日本。同时也是一个外国对其发动攻击将更甚于无意义和令人道义的日本。

在 1946-1952 年的十年中，战败后的经济复兴计划引起担任各长期计划组职务局形成了二十个报告，事后这些报告都罗列教育一样状况了地修改。这就反映出了那些计划了地修改，与其说是严格执行的依循，倒不如说是且作权宜的权上谈判，可以说，唯一例外是经济复兴计划案，即 1952 年完成的《经济复兴计划案》，它要求将 1950-1960 年的生活水平，它指出，那时日本对外账户将大抵平衡，日本人也会减少到近 2 亿人的可控规模。

日本战后第一代决策者全景记录
其参与和经历的日本经济起落五十年

刘柠 傅蔚冈 余世存
特别推荐

迹的

「日」都留重人 著

李雯雯 译 于杰 校译

终结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 / (日) 都留重人著; 李雯雯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 7 (2021. 7 重印)
ISBN 978-7-220-11889-0

I. ①日… II. ①都… ②李… III. ①经济—研究—日本 IV. ①F131.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90953 号

Japan's Capitalism; Creative Defeat and Beyond by Shigeto Tsuru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0 by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 Beijing Skycloud Culture Promotion Company.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21-2020-225

RIBEN JINGJI QIJI DE ZHONGJIE

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

[日] 都留重人 著 李雯雯 译 于杰 校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邵显瞳 罗爽
张科
戴雨虹
林泉
许茜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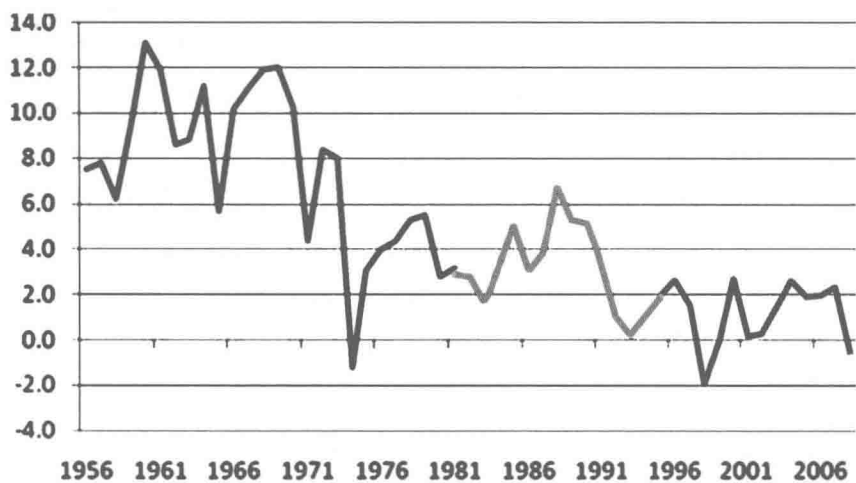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145mm×210mm
12
245 千字
2020 年 7 月第 1 版
2021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978-7-220-11889-0
79.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从制度的角度，日本在高速增长长期后的境况极其重要。

都留重人



1956-2008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对比前一年，单位：%）

资料来源：日本政府内阁办公室



与都留重人相交已逾半个世纪，友谊之始则要追溯到二战前在哈佛的岁月，从那时起，我和他便一直以各种方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但我们之间又岂止是友谊？确切地说，这些年来，都留重人一直是我研究日本经济、政体无人望其项背的导师、引路人。正是这一点驱使我接受了写序的任务，绝非为了在马克·珀尔曼妙笔所撰履历的基础上锦上添花。

像本书这样讨论日本经济可谓前所未有，我很难想象有一本书可以同样将其他哪个国家近五十年的经济发展阐述得如此专业，如此富有洞见。而本书真的做到了，且语言晓畅、简练、令人信服。我们习惯关注日本在其他领域的成就和卓著，本书则突破时下的泛泛视角展示了其经济史上的非凡成就。

通过对经济（和政治）史实加以铺排，进而将其组织进内容广博的不间断叙述，都留表现出了在历史书写方面的超高水准，

人们只能钦羨他挖掘出不乏相关资料支持的历史细节并连续使用的技巧。但本书的亮点并不仅止于此。

还有作者的视角。这需要冷静、客观地看待市场主体的成绩和公共政策。都留先生不仅着眼于两者各自的优劣势，同时也注意到了各自的意识形态及经济利益诉求。所有这些均被捕捉到，偶尔还夹杂着批评。我必须强调：这种精湛、渊博的学识素养正是推荐本书的主要原因。

不过，若以为本书是传统意义上的日本经济发展史，那就真的误会了。在本书后面的部分，都留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探讨既展现了更为广泛的视角，又提供了丰富的细节。这后一个特点从对大城市土地投机和社区遭到破坏的观察，到国营企业私有化的形成及混合经济的概念，均有体现。接着在最后一章中，他提出了日本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他特别讨论了防务问题，在他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是消除因日本不会走向任何形式的军国主义而导致的恐惧。他还讨论了针对贫困地区、日本自然风景的保护、医药发展，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政策。没有读者会怀疑，这一切都闪耀着通达的智慧。

最后还有一个显著特征。自二战后日本初被美国占领以来，都留重人亲身经历了本书论述的许多事件。其中一些甚至是积极参与，主要原因可能要溯及他在广泛传播的社会民主政治思潮中的作用与领导地位。不过，没有人会当真认为本书是个人历史的摹写。作者在重大决策中的作用，抑或他当时的看法和态度，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笔带过。本书是日本资本主义及其现状的发展史，并不涉及作者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而发挥过如此作用的

人倒是很少会像作者这般沉默不语。

还有更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穿插在行文中的绝佳文献资料，只不过这些都有待读者自己去发现。再怎么讲，日本文化终究有些难以理解，又因日语施加的障碍更趋复杂，对此，多年来已有大量讨论。本书开头几页谈到，在麦克阿瑟时期，曾有一个期望值过高的美国教育代表团认为，语言改革应当作为一项主要目标，因为这不仅对外国人有利，也能造福日本人。但读完本书后，没有哪个对日本经济发展、前景及其必要的政策过程感兴趣的人会因为设法了解日本经济状况经历的困难而抱怨。同样地，如果谁没有读过本书，那他就没有资格妄言自己充分了解日本经济发展及其前景。这些话貌似偏激，却绝非虚言。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译者序



告别高增长

二战之后，在美国的支持和引领下，西方经济体实现了快速重建和发展。日本经济在 1960—1970 年的表现，超额完成了原本以为很难实现的“十年倍增”计划，“日本奇迹”的风头很快盖过此前流行的“西德奇迹”。日本的政府咨询机构——综合能源调查会因此在 1970 年 7 月发布预测认为，日本经济在 1970—1985 年将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年均 8.5%~10.6% 的增长（参见本书内容）。这种高增长的预期在当时是日本社会的主流看法。

石油危机、越南战争以及货币动荡等一系列因素，导致美国经济在 20 世纪 70 年代遭遇战后未曾经历的困难。同样受到石油危机冲击，但日本的很多产业仍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快速发展，并迅速形成同美国同行竞争的优势，典型如汽车行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有美国学者认为，未来的世界将是“日本第一”。这也迎合了前述研究机构对日本经济增长潜力的预期。

也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全球热议“日本奇迹”时，本书

作者都留重人先生撰文提出日本经济增长面临拐点，算是对日本模式的警告。本书则是作者基于那篇文章写就的专著，他从战后美国在政治经济方面于日本的影响、日本的民主化改造及产业政策、包括环境在内一系列增长衍生问题等角度分析认为，日本经济的高增长难以持续。日本后来的经济增长速度验证了都留先生的判断：1972—1992年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不及 OERC 预测下限的一半；1992年之后的二十年，增长速度则不及1%。

都留先生是熊彼特的学生，深得现代经济理论精髓；是战后日本第一本《经济白皮书》的牵头人和起草者，熟悉日本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态。他从历史的角度，结合日本国内外政治因素进行的经济分析，有别于其他研究者事后的数据、事件记录，对研究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同样有益。

不考虑其国内政治因素，战后日本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包括美国在内西方市场对日本的开放；其二是日本官方基于前述因素开展的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前者的一个关键变量是汇率；后者则影响了高端如半导体、大众化如牛肉等诸多领域。汇率和产业政策这两个因素也为1980年之后愈演愈烈的美日贸易摩擦埋下了伏笔，因此尤其值得关注。在这位亲历者眼中，日元对美元的长期低估造就了日本产品在海外市场上持续的竞争优势；而日本的产业政策则很好地保护了日本国内市场、促进了日本相应产业的发展。这些看法同不少日本年轻人（包括官员）的看法不同。后者恰如1990年之后出生的很多德国年轻人对柏林墙无感、中国的同龄者则对加入WTO之前（更不要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经济没有概念。

决策者（政治家）和普通民众都期望经济高增长，各自背后的利益诉求可能不同。有的群体是相信经济可以“长时间”保持高增长，有的则不愿接受速度下降的事实。为了维持理想的经济增长速度，政策制定者尝试各种措施因此是情理之中。赶超型的经济体在技术追赶、市场准入和人口红利等竞争优势逐渐消失之后，其增长速度不断探底是必然过程，差别只在于探底的时间以及底的深度。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日本经济奇迹，是战后废墟上的追赶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西方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后，日本的后发优势逐步减弱；两次石油危机进一步拖累其经济增速。但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仍然取得了不错的增长成绩，这有两个方面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是美元升值拉动的出口效应；后半期是日本官方力图维持高增长而推出的一系列财政货币措施。后者在造就相对高增长的繁荣景气之余，也产生了大量的债务，进而导致后续超过二十年的不景气——还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日美间持续数十年的贸易摩擦，则是日本希望延续出口模式、维持经济增长的艰苦努力。我将陆续介绍相关著作给国内读者。

战后“日本奇迹”成功地塑造了“战后东亚模式”，进而引发了后续成绩各异的其他“奇迹”，这足以载入世界经济史册；另一方面，日本经济过去二十多年的持续低迷同样被关注。今天的日本仍然是发达经济体的一员，其成绩和教训均值得同为东亚模式成员的中国研究。

于杰

2019年11月9日

引言



日本经济的戏剧性重生——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从战后^①初期绝望无力的谷底跃升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的位置，可能以“凤凰涅槃”喻之都不为过。这种扶摇直上的势头只消一个数字就足可证明：以1950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为基数100，日本1973年的该项指标高达1412，相形之下，美国和西德分别为210和411。探究日本何以能够取得这项成就确是本书的写作任务之一，不过，它并不是笔者心中最重要的任务。

日本接受了国富民裕之路面临的挑战，其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方面的成就不容置疑。但富裕的隐患现在也同样明显，尤其是当城市土地“价格革命”和金融狂热的影响已渗入一个金钱至上社会的各个角落。1991年8月，就在我动笔写这篇引言之时，上

① 除非特别说明，本书“战前”“战后”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面提到的隐患之一渐趋明显——大量金融丑闻被曝光，涉及证券公司、银行、信用合作社，还有部分政府官员。正如《经济学家》所评论的：“[这些丑闻]让公众应接不暇，焦点切换之快堪比水果老虎机。涉案金额后面再添几个零，甚至发现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家金融公司都存在欺诈行为，应该也不会再有日本人感到惊讶。西方很多人士同样开始意识到：日本深陷泥潭……丑闻已经和日本的金融体制、政治腐败乃至企业经营模式交缠在一起。它们是系统性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它们本身的性质，还表现为它们引发的风险：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个资本来源国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日本充斥着欺诈这样的不端行为，并且由一帮盲目或自大的家伙所监管，可能——尚未但日后可能面临崩溃。日本的泥潭是危险的玩意儿。”¹

显然，作为“凤凰涅槃”故事的续篇，必须探究上述“系统性”丑闻与此前发生的日本经济事件及更为广阔的国际金融背景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和历史联系。读者们会注意到，这项任务我完成得并不充分，其中部分原因是丑闻的曝光后于本书的完稿。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第六章和第七章从日本资本主义的基本层面出发讨论其发展状况，因涉及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或可揭示近期金融丑闻呈井喷之态的系统性根源。为说明这种联系，我打算在这里补写几笔，希望将我个人长期以来研究这一问题的心得分享给读者。

熊彼特曾经说过：“你可以骑在马上，但却无法骑在对马的请求权上，而对货币或货币客体的请求权则与货币本身同样重要。”获得信用就是获得对货币的请求权，即按照一个叫作利率

的价格进行（资金的）跨期交易。在熊彼特的理论框架中，信用创造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但熊彼特可能做梦也没想到，在他离世后几十年里，信用工具增长速度达到了倍数级，甚至还出现了彼得·德鲁克所谓“符号经济”（资本运动、外汇汇率和信用流通）与“实体经济”（商品和服务的流通）脱钩的现象。²毋庸置疑，“当前经济形势下根本性的变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和重心已经从商品、服务的生产转移到了金融资产的购置、出售和增殖”。³

显然，统计数据为这一趋势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支持。就国际层面而言，是看国际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体量与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外汇成交量比对的结果。据报道，四大国际市场（伦敦、纽约、东京、多伦多）1989年4月的日均外汇交易净额高达4459亿美元，照此计算，全年则是111万亿美元。⁴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数字几乎是1989年世界贸易总额（约5万亿美元）的22倍。这一趋势还可以通过如下事实着重说明：1986年3月到1989年4月，四大市场的外汇交易额增长了116%，而四国（英国、美国、日本和加拿大）在1986年一季度至1989年一季度期间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额只增长了56%。过去几年里，二者之间的差距肯定还在继续扩大。

让我们将视线转到日本国内。如第六章所述，我们发现，由于城市的土地价格革命，以1987年为例，仅此一年地产的资本收益便高达416万亿日元——比该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343万亿日元）高出了20%还不止，堪称金融债权增长大大超过生产活动增长的铁证！

因此，国际金融活动和国内货币交易两个方面均显示，日本的资本主义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头重脚轻的结构形态——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存在着多层次的金融权利主张，相应地，“符号经济”梯队参与者牟利和投机的范围当然也在不断扩大。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接连曝出的金融丑闻，令证券公司、银行、独断专行的大藏省甚至黑社会势力均卷入其中，但它们本质上与法人资本主义时代向大众鼓吹挣钱要务的富裕陷阱别无二致。加尔布雷思最近警告说：“那些与货币联系紧密的群体，也许会，甚至极有可能做出自以为是和挑战错误底线的行为。”⁵这句话本身没什么可质疑的，但问题并不仅限于个人的行为模式。阿列塔和奥尔良在《金钱的暴力》中精妙剖析的那种“符号经济”下越轨行为的系统性根源⁶，已经成为今天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勉力攻克的难题。

土地价格革命的社会影响在本书第六章讨论，但该章并不涉及金融狂热对当今日本各个方面所造成的更为广泛的后果。有鉴于此，关于这一点，我会拿出一份证据，而该证据对日本的未来可谓意义深远。

最近对日本高中学生开展的一项意见调查⁷显示，其中50%的调查对象对“当今日本过于重视金钱和物质却看轻心灵和情感”的说法表示赞同。更有甚者，针对“你选择哪个颜色来描绘日本的未来”这一问题，有38.8%的调查对象选择了“灰色”，15.7%选择“黑色”，而选择“玫瑰色”的仅占3.1%。该调查清楚表明，日本的年轻一代正在为自己寻求具体的指导性法则，尽管他们确实是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斥着金钱的物质社会。讽刺

的是，当男童们被问是否知道甲壳虫的样子时，最常见的回答居然是：“嗯，我知道，我用一个 100 日元的钢镚儿就能买到。”

我认为，现在无疑到了像我这样亲历过日本从战争到和平、困窘到富裕的变迁史的一代人完成自身使命的时候，我们务必将学到的经验教训传承下去，并以醒目之姿主张我们对日本未来的具体设想，以期至少有 30% 而不是仅仅 3.1% 的高中生能够预见自己“玫瑰色”的前途。这也是我在最后一章努力的方向。

我还想解释另外一件事，借此机会说一下我在讨论日本战后的经济成就时不采取常用的增长计算法的理由。

比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提出的所谓“增长计算基本方程式”⁸如下：

$$\%Q \text{ 增长} = 3/4 (\%L \text{ 增长}) + 1/4 (\%K \text{ 增长}) + T.C.$$

该方程式中，Q 代表产出，L 代表劳动力，K 代表资本，T.C. 代表提高生产率的技术革新（或全要素生产率），3/4 和 1/4 则是各生产要素基于其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对经济增长的相应贡献系数。不过，由于技术革新无法直接测算，它的数值就作为余数计算得出，所以有：

$$T.C. = \%Q \text{ 增长} - 3/4 (\%L \text{ 增长}) - 1/4 (\%K \text{ 增长})$$

在该方程式基础上，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代入美国在 1900—1986 年期间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单个劳动力每年的产出增长率为 2.1%，其中，技术革新每年贡献的增长率为 1.85%，资本深化贡献了其余的 0.25%。但根据近期对美国的统计研究，通过增长计算法得出的技术革新贡献份额并没有如此之大。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在日本战后高达 10% 的年增

长率中，劳动、资本和技术革新各有多大贡献？如果我们可以将结果与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进行比较，想必会非常有趣。再者，我们还拥有日本经济学家们采用上述增长计算法取得的研究成果。读者可以从日本经济企划厅年度经济报告提供的数据中找到答案，例如，1970—1989年期间的产出增长率为4.8%，其中资本贡献2.9%，劳动力贡献0.3%，技术革新则是1.5%。

这些数值有多大用处令人好奇。就我本人而言，自罗伯特·索洛1957年首次提出这一构想以来，我就一直对这种增长计算法抱怀疑态度；我还在1965年就该问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⁹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我在这里讨论该问题皆因它关系到我个人观点背后的基本方法论立场。

读者会注意到，当我探讨技术进步的作用时，我只是捎带提及实际财富层面（或实际形态）与社会制度层面（或价值形态）的差异。¹⁰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是，技术进步属于实际财富范畴，它确实能对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层面产生影响，使得后者发生质的变化，往往还是基本维度的质变。这种区分实际形态和价值形态同时又要求寻找二者之间联系的研究方法，对体制发展的历史分析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1985年出版的本人所著“马蒂奥利讲座”系列丛书中对这一问题也有过广泛讨论。¹¹

更具体地说，增长计算法的根本难题在于：技术进步属于实际财富范畴，而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本质上则属于价值概念。为了套用该计算法所依据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资本和劳动就必须被视为性质相同的实体单位。然而，对一个动态经济来说，设计同时包含劳动和资本的计量单位并非易事。举个例

子，人们是无法避免资本内在价值受利率影响、受工资水平调整上的时间影响及各种交叉因素的影响，除非我们假定存在一种“机器类型单一且不发生任何技术革新”的极简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里，E. 丹尼森等人已经对计算增长的技术手段做了许多改进，但这种方法的实际价值仍让人心存疑虑，因为充其量就像关于日本的常识性判断所言，“日本在 1953—1971 年的超高增长率不能归功于任何单一决定因素”。¹²

我认为计量经济增长的单位问题至今未解决。即便是像凯恩斯、哈罗德这样在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发展史上发挥了先驱作用的经济学家，也因为各自的际遇意识到了单位选择中的特殊困境——源于生产过程，尤其是整个经济体系双重性（价值属性和物质属性）的困境。众所周知，凯恩斯的解决之道是采用劳动单位和（或）工资单位。哈罗德也在自问自答的过程中试图克服同样的困难：他先是提出中性技术进步是否要求追加投资的问题，然后又答道，这是一个定义问题——答案取决于选择劳动价值标准还是商品价值标准。劳动标准与商品标准之间的区别相当于价值形态和实体（或物质）形态之间的区别。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微观经济学在价值世界的探索几乎毫无滞碍，而宏观经济学，尤其是动态宏观经济学，却发觉自身很难摆脱该课题实体或物质层面的桎梏。在这个意义上，对研究不存在技术变化的短期问题更感兴趣的凯恩斯选择劳动标准，而偏好动态经济学的哈罗德选择商品标准，就很容易理解了。

我希望上述内容能够解释清楚我在研究方法上的倾向性，也算是在我没有在本书中采用增长计算法给读者一个交代。